

第4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 四 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八九九二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12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10 定价: 1.40元

限国内发行

稿 约

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刊物,目的在于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本刊欢迎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下列译稿:

1. 论文;
2. 专著择译;
3. 有重要价值的短篇资料和回忆录;
4. 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和情况综合评介;
5. 书评(译稿与撰写稿均可);
6. 其他。

二、来稿要求译文准确,经过详细校订。译稿中人名、地名、机构及官职名称等,务请查核清楚,翻译准确。标点符号、注释、数字、年月日等,请参照本刊规格,以求统一。

三、来稿请附原文。如决定采用,即行通知;一经发表立致稿酬;如不采用,妥为退稿。

四、来稿请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请注明真实姓名(发表时署名听便)、工作单位及详细地址,以便联系。

目 录

- 1 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实践 (1905—1912)
..... C·齐赫文斯基 丁如筠译 邹宁校
- 28 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资产阶级..... 白吉尔
黄庆华译 胥森校
- 67 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 巴斯蒂
王刚译 张振鹂校
- 95 辛亥革命在东三省..... 西村成雄
傅仲译
- 139 1928年中国革命新战略的出现..... 索顿
林海译
- 168 1900年中俄满洲冲突事件新探..... 郭玫瑰 辻伸久
吕其苏译 吕浦校
- 206 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政策..... 北冈伸一
郑基译 赵明杰校
- 271 瞿秋白与彭述之论中国革命问题..... JI·捷柳辛
曾宪权译 陶文钊 邹宁校

资 料

- 294 关于孙中山的一份未发表过的电报
..... C·胡谢伊诺夫 曾代伟译 林荫成校
- 297 沙俄通过修筑东省铁路掠夺我国东北
煤矿资源的几则材料..... E·尼鲁斯
陶文钊译

- 306 威廉二世关于沙俄占领旅顺口……………JI·捷列舍瓦
陶文钊译

争 论

- 317 共产国际对华政策……………B·格鲁宁
吴永清译 邹宁校

动 态

- 356 法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最近动向的考察……………巴斯蒂
刘存宽 张振鹞译

简 介

- 369 苏联远东研究所简介……………吴永清
385 稿约

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实践

(1905—1912)

C·齐赫文斯基

义和团起义以后，清廷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以及外国资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某些改革，以推动国内近代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然而，中国资产阶级并未因此停止反满和排外。

1905年间，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十分活跃。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它在国内外已有四十个分会），以及“光复会”、“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

鉴于国内反满情绪不断增长、革命思想在旅居海外的华侨当中日益广泛传播，以及俄国爆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孙中山遂认为，必须联合一切反满团体，共同为推翻清王朝而奋斗。1905年7月30日，中国各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在东京召开，会上孙中山倡议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与会代表一致拥护这个倡议。

为保密起见，代表们将“革命”二字删去，定名“中国同盟会”。与会者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纲领是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制定的，^①它集中体

^① 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是孙中山1905年在布鲁塞尔中国留比革命学生会上阐述的。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把它具体化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现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口号中。1905年9月18日，在东京举行“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领导机关，通过了《军政府宣言》，《宣言》中阐明了“同盟会”的政纲。大会还根据孙中山的倡议，制订了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其中包括《安民布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对外宣言》等等。^①

本文只论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外交活动，不拟详细分析“同盟会”的整个纲领。

《对外宣言》是孙中山当时起草的主要外交文献。《宣言》说：“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民之福祉。”^②

《宣言》以国民军的名义提出革命党人起义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遵循的七项原则：

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

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③

《宣言》想说服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革命期间保持中立，并且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它们倒向满清政府一边。在“同盟会”的这个官方文件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反帝口号，以及恢复被列强践踏

①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重庆1944年版），第1篇，第44—104页；又见《辛亥革命》（上海1957年版），第2卷，第3—93页。

② 《辛亥革命》（上海1957年版），第2卷，第33页。

③ 同上

了的中国主权的的要求。可见，“同盟会”的对外政策完全服从推翻清朝专制制度这一目标的需要，具体说来，就是要破坏满人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盟。

1906年4月5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民报〉的六大宗旨》，对“同盟会”的对外纲领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六大宗旨是：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护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①

前三点是人所共知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三点是首次提出来的。《民报》编辑部对“维护世界真正之平和”这一宗旨作了如下的解释：“……平和为人类之福，犹一国之安宁秩序，是故扰世界之平和者，为人道之贼。……今各国鹰瞵鹗视，竞逐于世界之舞台，相憚莫敢后，相顾莫敢先者，何为也？曰：为均势问题也。均势问题，不在弱小之邦，而在强国，若英、法、俄、德、美、日本，皆其倚著之重点也。然尚有中国以其位置资格，决然不当后于六强而萎靡不振，几徙供他人鼎俎之资，此远东问题，所以极促世界之注目，而终以均势之难而不解决也。”^②

文章指出，俄日战争没有解决远东问题。《民报》编辑部在阐述孙中山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的思想时指出：

“欲求真正平和，当始于中国为独立强国之日。中国为独立强国，则远东问题解决，均势问题亦解决也。

“……故曰：吾人所以倾覆政府者，直接为国民幸福，间接为世界平和也。”^③

文章猛烈地抨击了1902年英日协定，《民报》认为，这项协定无助于中国的富强，因为它把中国，以及与保持远东“均势”有关的其他大国排除在外。《民报》编辑部尖锐地批驳了日本政客小

①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重庆1944年版）第2篇，第446页。

② 同上第2篇，第450—451页。

③ 同上，第451页。

熊重信对英日同盟的评价，他认为，同盟的“使命是实现‘均势’原则，并且可以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使中国国情发生变化”。

《民报》编辑部在阐述“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这一宗旨时指出，日本国内对中国普遍持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侵略中国；另一种是主张中国向日本“靠拢”。《民报》认为，对中国及其四亿人民的不平等态度，乃是这两种观点的基础。编辑部文章指出，日本国民应当明白，满清政府和中国人民是势不两立的。

《民报》之所以主张中日两国国民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社均设在日本，再则侨居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迫切希望日本当局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关照。

《民报》的第六宗旨“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实际上是再一次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当前中国人民反对满清政府的斗争保持中立。反过来，革命党人将保证尊重洋人在中国的利益。文章指出，推翻满人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将继续履行清政府所签订的一切国际条约和协定。其实，《民报》的第六宗旨，和上面所分析的《对外宣言》的精神完全一致。

《民报》所阐述的“同盟会”对外纲领，实际上全面重申了孙中山早在1904年《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所提出的基本原则。

从《对外宣言》和《民报》编辑部文章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及其战友对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反动政府结盟的性质缺乏认识，他们以为，只要给列强以种种许诺和保证，它们就不会干涉反对满清的革命。

他们的对外纲领的这种局限性，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不敢依靠劳动群众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和伊朗、土耳其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解放思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对他们的实际活动有着极大的影响。中国的革命报刊广泛报道了俄国1905—

1907年事件，在这方面表现积极的，当首推《民报》，它大力宣传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经验，并号召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经验。^①

中国革命党人撰文赞扬俄国各族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文章说：“俄国革命之大风潮雷动全球，……世皆知为俄国社会党之力。特其民未获自由，则其对内政策不得不异于列国，而未尝不为吾国改革方针之一助也”。（《民报》第4号）俄国革命“为他国革命未逮者，……”（《民报》第6号）。“今以露西亚之国，其专制政治组织之完密、强固，宜非满洲政府所敢望，然其国之革命志士，牺牲流血，犯难而与之争者，至今不屈。此支那革命党所赞叹而呼为同调者也。”^②（《民报》第11号）

虽然孙中山本人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是，大部分文章，而首先是刊登在《民报》上的文章，都经过他本人亲自审阅和认可，因此，这些文章实际上是集体创作的成果。^③

然而，必须指出，无论孙中山或者“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

① 荣孟源：《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载《历史问题》1955年第6期，第98—104页。这期间，《民报》刊登了以下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文章和新闻资料：《尼夫阿利亚（即拉脱维亚）之独立》（第2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3号）、《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第3号和第7号）、《俄国革命党之日报》（第4号）、《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5号）、《俄国立宪后之情形》（第6号）、《虚无党之小史》（第11号和第17号）、关于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的短篇小说的译本，等等。《民报》第2号刊登了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的肖像，第3号刊登了米哈伊尔·巴枯宁像。以及行刺巴库总督拉加·希芝的现场画片，第11号刊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照片，第14号刊登了西伯利亚某监狱中俄国政治犯的两幅合影照片，第15号刊登了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Г·该鲁鲁尼的照片，第19号刊登了莫斯科总督于1908年被炸毙的现场画片，第22号刊登了俄国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和哥萨克士兵驱散示威游行群众的画片，以及其他画片。每一幅插图都附有简短的说明，从说明文字中不难看出，《民报》编辑部是同情俄国革命的。

Л·丘扎江（Л. С. Кюзалжан）：《论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影响》（载《世界文化史通报》1959年第6期第29—44页），对《民报》论述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系列文章作了分析。

② 引自《历史问题》1955年第6期第99—101页。

③ 见斯卡拉皮诺（R. A. Scalapino）和史扶邻（H. Schifffrin）：《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载《亚洲研究杂志》第18卷第3号（1959年5月）第324页。

都对俄国革命营垒内部的阶级构成，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列宁布尔什维克派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粹派，以及工人运动中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展开的尖锐的政治斗争，缺乏明确的认识。

《民报》把俄国革命营垒内部的所有活动家，统统说成是“虚无主义者”。必须指出，“虚无主义者”这个词主要指民粹派，他们的观点和孙中山本人及其战友的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①

“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和民粹主义者一样，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懂得工农群众的创造性的革命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先锋队——革命政党的作用。他们常常混淆革命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两者的界限。为了和俄国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他们接触的多半是侨居国外的民粹主义者。1905—1907年，在日本避难的俄国政治侨民人数大为增加，其中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民粹主义者。^②孙中山曾会见1906年刚从西伯利亚的阿卡土监狱逃跑出来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的首领P·该鲁学尼，^③以及老民粹主义者H·苏济洛夫斯基（侨居国外时化名鲁赛尔，俄日战争结束后，曾在长崎出版过《民意报》）。

孙中山和鲁赛尔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之间友谊的基础是共同的革命目标。^④在他们相互探讨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最能说明孙中山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对华政策所持的外交观点。对于鲁赛尔提出的中国应吸引外资和外国专家来进行经济建设的方案，孙中山有所保留。^⑤他在1906年11月8日信中写道：“看来，您是如此坚

① 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成员的思想影响，中国史学家谭彼岸曾对《民报》刊载的资料作过分析（见谭彼岸：《俄国民粹主义对同盟会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第35—44页）。

② A·赫菲茨（A. H. Хейфец）：《二十世纪初期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载《历史问题》1956年第12期第96页。

③ 《历史问题》1955年第6期第99页。

④ 扬森（M. B. Jansen）：《日本人与孙中山》，第124页。

⑤ H·鲁赛尔（H. K. Руссель）和孙中山的来往信件，是苏联史学家A·赫菲茨在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发现的（全宗5825，目录1，卷宗199），后来在其《二十世纪初期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一文中加以发表。

决地主张美国资本家和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可是您真的相信，许多人都会接受您的劝告投身到这项高尚事业中来吗？

“我深恐中国问题是绝不能引起欧美人士注意的，但是我希望由于您的善意号召，全世界大公无私的人们将会逐渐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①

在1906年11月26日的信中，孙中山更加明确地指出外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奴役性，他说：“也许，我错看了您对美国资本家的呼吁，但如果不是出于真正利他主义动机的话，那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不至于笨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我们不指望外来的援助（不管这种援助的愿望如何），它如果不是出于真正利他主义动机的话……”。^②

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道，并不是中国革命党人了解俄国1905—1907年事件的唯一消息来源。著名的布尔什维克B·库尔纳托夫斯基原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后来逃了出来。1907年辗转来到长崎，并且在横滨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提到，据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说，孙中山于1905年在巴黎结识了Г·契切林，并与他就革命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③

日本社会党人的活动，对中国政治侨民和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日本社会党机关报《平民新闻》（1907年1月20日）有几句话，足以表明他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的态度。

① A·赫菲茨：《二十世纪初期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第97页。

② 同上。

③ Л·丘札江：《论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影响》，第38页。

该报说：“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深表同情，并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他们进行斗争，同时，我们期望他们在日益宣传共和与统一税收的基础上逐步前进，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①

《民报》的文章十分重视宣传日本社会党人的经验，尤其是幸德秋水^②和片山潜的思想。孙中山周围的革命民主派，通过日本报刊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朱执信在《民报》第2、3号上发表了德国社会党人的传略，其中有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有《共产党宣言》译文片断。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民报》第5号），朱执信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提出了阶级斗争必然要在中国发展的问題。^③

这期间，“同盟会”与在日本避难的印度政治侨民建立了联系，《民报》经常刊登他们的文章。中国革命党人一向维护和提拉克拥护者的友谊。^④他们还和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潘佩珠（1905年抵达日本）过从甚密。^⑤

在日本社会党人的倡议下，许多国家的政治侨民在东京成立

① 引自斯卡拉皮诺和史扶邻：《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第341页。

② 幸德秋水（1871—1911）系日本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10年6月，幸德及其二十五名战友被诬告“密谋”反对天皇而被捕，1911年1月24日被处决（见《日本近代史纲（1640—1917）》（莫斯科1958年版））。

幸德的活动对当年侨居日本和聚集在“同盟会”周围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反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06—1910年间，幸德这位赫赫有名的政论家和演说家，在日本社会党人以及侨居日本的亚洲各国革命者中享有盛名。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促使日本广大民众关心俄国革命运动（他对这个运动的国际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③ 见斯卡拉皮诺和史扶邻：《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第329—333页。

④ Ⅱ·丘扎江：《论1905—1907年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影响》，第41页。

⑤ 有关中国革命党人和越南革命志士交往的详情，参看Ⅱ·丘扎江：《亚洲觉醒时期越南与中国的革命联系》，载《历史问题》1961年第1期第86—102页。

了“东亚和亲会”。^①它把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侨民中的革命者同日本社会党人联合起来。“亚洲和亲会”的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和亲会”要求会友“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凡愿意入会者，皆可入会，“支持帝国主义侵略者除外”。^②《约章》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在“和亲会”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随着日本反动派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展开进攻，“和亲会”也因违背日本军阀和统治集团所鼓吹的沙文主义与泛亚细亚主义信条，而被当局取缔。1908年10月在东京成立的另一个革命侨民组织——“东亚同盟”，也是同样的下场。它总共只有五个月的寿命。据潘佩珠证实，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有朝鲜人、越南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和十几个日本社会党人。由潘佩珠发起，1908年在日本成立了“云南-广西-越南同盟”，入会者有越南革命志士和与越南接壤省份的中国留日学生。该同盟仅成立三个月，即被日本当局应清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请求而取缔。^③

孙中山对东方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斗争深表同情。1905年，他在东京会见潘佩珠时曾向其保证：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则举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④

1906年12月21日^⑤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

① 扬森(M. B. Jansen)在其《日本人与孙中山》一书中称之为“亚洲和亲会”(见扬森：《日本人与孙中山》，第124页。日本现代知名的史学家平野义太郎教授在其《反战运动的参加者》(东京1955年版)一书中，专辟一章来探讨日本社会党人(尤其是幸德秋水)同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平野教授援引了幸德家中收藏的档案资料，内有幸德用日文和英文书写的《亚洲和亲会约章》。

② 平野义太郎：《反战运动的参加者》，第149—150页。

③ 作者在此谨向A·巴里诺娃致谢，感谢她提供潘佩珠：《自我批评》一书的译稿，本文即引自该译稿。

④ 引自潘佩珠：《自我批评》一书译稿。

⑤ 关于《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开会的时间，记载不一。据《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记载，为12月2日。——译者

怀着深切的同情，向与会人员叙述了德兰士瓦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以及菲律宾人民坚决抗击美帝国主义者的事迹。他猛烈地抨击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不正义与极不完美的国家制度，并且断言：“……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①而且，他相信，只要中国人自己齐心协力推翻满清王朝，那么，“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②

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时，曾在当地华侨创办的《南洋中兴日报》上发表《论惧革命召（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论证中国人民反对满清政府的斗争，可以防止中国继续为列强所瓜分。他写道：中国革命党人无意于驱逐洋人，他们一心想使国家沿着进步和文明的道路发展，这样一来，列强就不敢来瓜分了。^③

虽然孙中山深切同情亚非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痛恨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侵略政策，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整个殖民制度，也要反对暗中支持中国反动清政府的帝国主义列强。

无论是当时，或者是尔后，我们都没有看到孙中山公开发表过任何反帝的文章。湖北省反满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杨玉如，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被迫避难于日本和毗邻中国的英、法、荷属远东殖民地，因而他们不能恶化与允许他们避难的国家或殖民当局的关系。杨玉如介绍了1911年春他和“同盟会”执行部干事刘仲文的一次谈话，他直截了当地问刘仲文，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刘仲文答道：“同盟会”东京本部领导人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同盟会”的对外政策务必审慎持重，因为满清政府早就和帝国主义列强秘密勾结，而且，列强假清廷

①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77页（中文版）。

②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75页（中文版）。

③ 《总理全集》（上海1930年版）第2卷，第104—106页。

之手推行其压迫中国人民的政策。刘仲文说：“所以，我们姑且含垢忍辱，这个——打倒帝国主义——工作为时尚早，只有等待第二步去办了。”^①

杨玉如对“同盟会”在筹划辛亥革命期间没有提出反帝口号的原因所作的说明，未必全然可信。我们认为，孙中山的对外方针和“同盟会”的指导思想，确实为以下因素所左右：深刻的社会与经济根源，首先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同盟会”的阶级成分，以及“同盟会”和那些害怕中国人民采取大规模反帝行动的华侨资产阶级的联系。

满清朝廷对国内声势浩大的反政府行动深感恐惧，乃于1907年1月照会日本政府，请求他们对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本部”采取措施。

自从清廷同意俄日朴茨茅斯和约的一切条款，并于1905年12月22日签订了中日条约和补充协定（日本因此获得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和优惠）以后，日本当局开始改变对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日本本土的活动的态度。^②由于清政府俯首贴耳的投降行径，日本统治集团便不再支持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

日本当局在接到清廷的照会以后，以孙中山在某次演说中曾攻击“日本的友邦满清政府”为口实，把孙驱逐出境。事隔不久，日本当局又把日本参谋本部的一名军官“塞进”“同盟会”东京分会中去。从此，“同盟会”东京分会便为日本人所控制，它拒不执行孙中山的指示，例如，不执行把收藏在东京“同盟会”仓库里的武器转移到印度支那的命令。1907年7月，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③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1957年版），第39页。

② 马克谟（John V. A. MacMurray）编《与中国缔结的及有关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894—1919）》（纽约1921年版）第1卷，第549—553页。

③ 据《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6页记载，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的日期为1908年10月。《民报》自创刊至此，共出二十四号。——译者